

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政治观研究

刘学坤^{1,2}

(1.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2.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海洋时代的国家关系、国家兴衰和地缘政治,现代海洋实践对社会革命的推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海权建构和现代海军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政治观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洋沟通国家联系、丰富国家关系,海洋深刻影响国家强弱兴衰,海洋活动塑造新的地缘政治。海洋经济通过对生产力推动不断更新社会经济形态,并在资本主导的社会运转过程中加速新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生成,复杂的海洋经济关系还直接引起新的普遍的社会矛盾,并为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条件。由探险、海盗活动到海洋贸易的海洋活动的现代性转变带来了海权需要,海洋扩大国家权力边界,但 19 世纪海权建设的实质常常主要是霸权体系形成,海洋法治处于艰难探索中。海军历史性地成为强国象征和海权的国家保障,海军的政治影响力增强源自海洋经济活动需求,海军运转高度依赖海洋经济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性特征,其所揭示的海洋政治的规律是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推动构建现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南。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政治;海权;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3-0014-10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和理论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海洋政治思想。他们高度重视海洋的作用,在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他们大量以海洋、航线等为例,海权、海军、航线、海运、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等是关于海洋政治论述中的关键词。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海洋权力、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已经成为国家之间政治的重要内容,海洋权力的争夺和海洋权益的配置是海洋政治的焦点问题。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分析和海洋文明史研究中,他们从以物

质生产为核心社会实践的历史角度对海洋政治核心关系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从海洋的自然状态到现代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海洋政治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政治分析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观的重要理论来源。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要求,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海洋重要论述和“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海洋文明创新需要重视马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21MLB010);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D/2021/01/9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B220201069)

作者简介:刘学坤(1981—),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E-mail:liuxuekun2005@163.com

克思恩格斯关于海洋政治的智慧。

一、海洋时代的国家关系、国家兴衰和地缘政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洋在与自然界中其他自然物质相互作用的唯物否定的辩证过程中同时实现着其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化与生成,海洋在人类的自然历史过程中不断增强其所引起的社会影响。海洋的自然属性在19世纪被开发转化出了新的生产力,海洋从一种自在的环境要素变成了一种生产和贸易过程中的核心要素,这一变化使海洋政治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了历史上的海洋政治现象,他们认为在海洋的自然历史过程和人类基于海洋的实践过程中,现代海洋意识得以形成,并创造了灿烂的基于海洋文明。由海洋航运等构成的19世纪的海洋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海洋经济的兴起使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及对这种实践的认识有了世界视野。这使海洋问题在他们的时代里成为重要的世界政治问题。

海洋沟通国家联系、丰富国家关系。海洋经济活动引起的变化使海洋摆脱了作为国家之间障碍的状况,而成为国家之间一种重要的联系和沟通,它使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依存等关系成为可能,使国家之间的现代性关系开始形成。海洋从把国家分开转变为把国家沟通起来,而且以一种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的沟通起来。“海盗时代”^{[1]37}的海洋不是国家之间的纽带,而是19世纪开启的海上贸易时代使海洋成为国家间社会关系的纽带。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这一过程中,工业发达国家更加外向,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增长。海洋航运所开辟的全新的市场体系对于国家发展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海洋带来全新的经济体系和世界体系,进而带来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

海洋深刻影响国家强弱兴衰。海洋从国家之间的障碍到国家之间的桥梁使关于国家和工业的世界观被改变,国家的运转方式也在这一过程中悄悄发生变化,有的国家快速成为世界强国,并具有将权力和权益野心延伸到别国的条件,同时一些国家的主权等丧失或面临丧失的风险。海洋价值意识的变化改变了国家对于彼此利益关系的理解,改变了处于不同阶段和状态的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将海洋强国作为独立命题来论述,但他们通过大量论述揭示了海洋强国的成长史、重要性和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恩

格斯的时代,基于海洋的权力强弱已经成为决定一国强弱的核心因素,海洋意识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核心意识,海上势力的强大已成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其他民族海洋意识尚未觉醒时,对于海洋的霸占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海洋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觉醒较晚的地区由于经济的劣势则成了殖民地,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世界的牺牲品。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荷兰、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的发展与海洋意识觉醒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海上强国在17—18世纪走向综合国力强盛的过程。这些国家以轮船取代帆船,工业和贸易空前发展,国家走向强盛,海洋与国运建立起紧密的关系,比如英国对于以航运为核心内容的海洋权益的争夺结果是18世纪末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被确立下来,并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和世界的历史。荷兰作为独立民族国家在取得对封建制度的胜利时即是“用它的海上活动证明了它独立存在的权利”^{[1]224}。而到了18世纪,科学技术已经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航海等技术推动着英国等国家的快速发展。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海洋事业兴衰放大了科技对于国家兴衰的至关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海洋时代兴起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国运、国际地位的变化分析中反复论证了这一规律,海洋强国需要科技维系和支撑,工业品生产技术和直接与海洋相关的造船技术、军舰技术和海洋航运技术等是那个时代影响海洋强国地位的核心技术。

美国同样也是依靠贸易和航运而快速兴起的,其依靠海洋复制着之前发达国家的崛起模式,美国“也像以前在荷兰人那里一样,最初出现的是与贸易和航运有密切联系的生产部门”^[2],这一过程后来就发展到了这一状况,“美国国旗是英国国旗的最危险的竞争者,在海洋上大有超过后者之势”^{[1]340}。德国更是如此,“比1866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意义重大的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兴旺。尽管这些进步还赶不上英国以至法国在同一时期所取得的进步,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20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真正地、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世界贸易”^{[3]207}。海洋航运业成了资本主义基础性产业资本的重要萌芽地之一。

19 世纪西方迎来了海洋时代,海洋对于城乡尤其是城市社会空间的生成与公共性的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19 世纪是城市在经济中崛起的时代,城市居民和他们的生活是经济的命脉,而海洋改变了城市的运转,海洋对于一个城市的命运和城市居住者生活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在欧洲沿着海洋分布的城市在国家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口也向城市不断集中,因此沿海城市不断兴起并因为经济和人口原因产生对国家命运日益重要的影响。能否因海洋而形成一个或多个区域性或世界性重要沿海城市,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国家的兴衰。

海洋活动塑造新的地缘政治。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海洋不仅是重要地缘政治环境,而且是重要的地缘政治议题,19 世纪海洋所支持的新经济关系和价值关系正在突破旧的海洋意识而形成海洋时代的地缘政治关系。国家边界在海洋活动扩张中被渗透,并在一些地方趋于失控,一些相对发达的国家出现更多排他性海洋活动,这加剧了政治不平衡。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 19 世纪地缘政治的重要转型,海洋使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海洋和陆地共同构成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场景。海洋秩序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洋改变了国家之间关系互动的方式和格局,形成了更复杂的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海洋活动使区域强国成为全球强国,使一个地方的地缘政治力量对比扩张为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力量,如美、英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海洋同时也逐渐成了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转移政治系统危机的场地,地缘政治关系也更趋复杂。

马蒂内利认为“当代全球状态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并已经被这种历史经验所塑造”^[4],全球状态生成后不断孵化出支撑这种状态的制度、市场导向的产业资本主义和主权意识不断强化的民族国家。海洋活动是推动欧洲包括政治现代性在内的整个现代性及全球状态出现的最重要实践,但是主权意识等催生的海洋问题的政治化解决整体比较迟缓,海洋政治成为国家间冲突的重要原因。19 世纪海洋并没有构造出稳定的政治秩序,但是海洋社会形成带来交融与冲突,改变着世界政治秩序。马克思恩格斯从其时代观中对于 19 世纪的海洋政治的时代情境进行了分析,并在他们对于太平洋时代等的论证中提出了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新的理解。

二、现代海洋实践推动社会革命并使其成为世界革命

海运生成了社会的革命因素,因为海洋全面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形态和人的居住形态,进而这些经济基础也要改变人的意识和精神,形成了改变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力量。海洋经济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方式是改变社会形态的力量,能有力推动新社会形态形成。

海洋经济通过对生产力推动不断更新社会经济形态。“资产阶级本身最初是一个封建等级,当 15 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5]110}。但是对封建生产力的改变在本质上就是对封建社会的反叛,“航海业是确实确实的资产阶级的行业,这一行业也在所有现代的舰队上打上了自己的反封建性质的烙印”^{[1]217}。

海洋带来的经济变革是革命的“生产方式上的前提”^[6]。海洋推动资本主义商品借助货币的全球流动,带来了资本主义微观形式实现的社会权力扩张,它使关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渗透到海洋强国的各商品倾销地。海洋社会需要政治解放,并在人类解放、海洋关系相关国家政治解放中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政治权利宏观、微观批判为海洋政治关系变革、革命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新的国际海洋政治生活建立打开了视野。

海洋在资本主导的社会运转过程中加速新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生成。海洋在政治上引起的巨大变化之一是海洋带来的阶级结构与力量对比。海上航路不断加速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航运业等海洋经济形式和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新形式在现代资产阶级产生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3]32-33}。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也在快速壮大。“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有了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

级”^{[3]216}。同时伴随着这一阶级状况的是剥削的加剧,无产阶级者的困苦,新社会矛盾的出现和尖锐化。由于海洋经济,新的生产状态不断出现,海洋生产力的增强引起生产关系属性的变革,它们把人类革命和人类社会不断带入新时期。

复杂的海洋经济关系还直接引起新的普遍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在政治和经济等各层面表现出来,有的表现为国内矛盾,但在根本上又是世界性矛盾。海洋经济引起的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远征和殖民地的开拓等所有这一切带来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及社会矛盾的新情况。它使资产阶级的活动和资本主义经济都成为世界性的,使各地的残留的封建主义同时成了危机,使各地的革命因素同时在快速生成和增加。“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3]32}。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使社会矛盾、革命因素和经济变化以同样的速度同步发展。

历史上东西方贸易主要建立在上层人士消费的基础上,而海上运输的经济性和全面的工业品的平民化开启了历史上劳苦大众与工业的新关系及全球性大众生活苦难性的同质化和普遍化。海洋推动的大工业塑造着世界性的规模化的低生活水平,这种新的规模性的苦难状况的出现是人们的剥削意识、不平等意识和革命意识出现的基础,扩大的交往加速他们产生这种意识,这些意识稍增强就可产生世界性的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因此可以说,海洋在革命意识生成和革命时代到来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海洋航运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加剧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19世纪,“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7]521},但这只是整个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和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大量其他新的矛盾也时刻生成着,比如城乡差异日渐扩大,但这一切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普遍的阶级地位和生活的巨大差异的生成。马克思恩格斯还准确预测了在海洋时代兴起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前景。他们对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也有不少的关注,很多都与中国相关。

海洋为资本主义所用,但也会因其巨大的历史性力量去否定资本主义。海洋航运业和基于海洋航

运的贸易是资产阶级的行业,但是这种海洋经济内部也生产着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海外贸易、海外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殖民制度不断生成否定自身的社会革命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8]。政府与海洋活动推动形成的大市场与并没有培育出共同体机制,排他性海洋战略和竞争力不断强化,并阻碍支撑平等的海洋活动的政治机制的形成,因此快速增长的依赖海洋的经济和市场引发国家间广泛的难以协商的矛盾,最终必将成为全球性有力推动革命性政治现代化的条件。历史验证了这一点,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晚期的不断扩大的革命,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性革命与战争及其后的世界海洋政治的变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化都是例证。

海洋所形成的世界沟通是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洋引起的国家关系、政治关系的变化分析是依据其社会本身运动的规律。海洋经济带来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它们是创造旧的国家政权的力量。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革命的时代”^{[3]33}的革命原理分析,海洋引起的生产生活方式制约着19世纪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随着海洋物质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它开始同当时国家间经济权益关系和其他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海洋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形式成为要求普遍发展的生产力的桎梏,推动突破国家界限的大范围的社会革命。海洋活动等所生成的殖民制度不仅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提升到新高度,还必将重塑这个世界的政治关系。殖民制度、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促进着海运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又加速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并为世界性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

海洋将在未来社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塑造新社会形态的重要力量。海洋社会是社会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海洋协助生成了现代世界观,它也会历史性地打破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对改造世界产生历史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海洋活动及其历史作用和未来的研究是在他们改造世界功能的哲学观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对于海洋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大胆预测,认为海洋将在全世界未来的变

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540-541}。

三、基于不平衡的海洋政治经济关系的海权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海权理论是其海洋政治观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海权是海洋意识的现实化和时代化。海洋政治是依托 19 世纪中后叶不断壮大的海洋经济而生成的,此时的海洋政治是权力政治和利益政治,由于权力和利益,大多数国家被卷入以海洋为中介的海洋政治过程,海洋从自然场域走入政治场域源于海洋向权益客体的转变。海洋的资源属性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后的不断强化使海权内容更丰富,海洋政治关系也更复杂。

由探险、海盗活动到海洋贸易的海洋活动的现代性转变带来了海权需要。基于 19 世纪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为海权的内涵奠定了基础,海权核心内容是海洋贸易安全的保障,主要任务是确立海洋经济安全保障框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权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海权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思辨出来的,而是在经济和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现实的意识。海权意识是人类海洋实践的产物,它的出现源于新的工业形态的生成,这种工业高度依赖海外市场,这一权利边界延伸的历史性现实基础是一个国家的日益丰富的海洋实践。航海行为与经济行为紧密结合的过程是海权意识兴起的过程。社会化的大生产、全球化的贸易、新的市场形态和世界的联通是海权的基础。新的基于海权的力量把世界各个地方快速地改造并纳入世界体系。海权的内容和围绕海权的政治经济规则也不断复杂化。

到 19 世纪海洋权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一方面,工业的发展生成了大量的以海权、海军等为内容的新的海洋意识,这些海洋意识又极大地以历史性力量改变了工业的面貌。另一方面,这种海洋意识的新的想象和现实化又以工业为基础,大工业为海军、海上航线和海外市场提供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各地的海洋意识快速觉醒,以工业为内容的现代化和海洋意识的政治化加速。

19 世纪的欧美海洋强国持续地把他们认为有经

济价值的海洋政治化,围绕海洋兴起的经济事实引出了新的“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9]。海洋活动带来了国家主权的侵蚀或增强和国家之间更多的相互联系,进而带来了国家之间权力互动或竞争的复杂系统性问题。而此时政府和参与海洋活动的公司之间尚未形成稳定互动模式和规范框架,因此国家间海洋政治与海洋经济的不平衡互相强化,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国家因海权扩大权力边界。

海洋缺少公共管制和一些国家的自私野蛮行动驱动了海洋经济的野蛮增长和海洋政治重要性的增强。海洋经济推动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而这一过程对国家的和世界性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洋带来社会关系空间的深刻转变,这种关系不断延伸带来个体和政治单位、经济单位等组织的跨大陆、跨地区活动的增多和权力关系网络的形成,驱动政治现代化发展,不平等事实开始大量跨越国家边界。海军、海洋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被塑造出来,海洋治理、海洋政治等新问题浮现出来成为重要政治问题,而且这一过程并不是以线性均衡或统一的方式进行的,速度也不是均匀的,海洋政治在全球海洋体系、全球各大洲、大洋和国家间以一种差异巨大的状态进行。海权问题作为历史性政治新问题日益突出。

海洋扩大国家权力边界。海洋所沟通的社会关系是物化的被遮蔽的社会关系。海洋制造出的世界市场和新的经济事实作为海洋时代的新的现实的关系,“这些现实的因素绝不是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10],海洋扩大了国家权力的范围,改变了其运转方式。资产阶级的活动到哪里,政治权力就会迅速延伸到哪里,进而引发政治关系生成。

海权建设的实质主要是霸权体系形成。19 世纪的海洋强国是海洋社会控制性物质力量,它们自然支配了海洋社会的关于规范制定、话语权占有等精神生产,控制了海洋社会的政治生活,掌握了海洋政治社会的领导权,以海洋物质关系控制了海洋政治为核心的精神关系。海洋中的资本关系决定了海洋政治权力关系。19 世纪海洋文明的“进步”成了海洋推动资本扩张,增加其支配和控制权力的客观力量。海洋时代兴起后的海洋社会关系一直缺少稳定性,它一直建立在强权基础上,也没有带动更多地方和国家的发展和利益满足。海洋空间秩序这种不

稳定的社会基础必须不断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海洋空间的不公正,但是形成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真实共同体理念的公正的海洋秩序这一进程至今尚未完全实现。

19世纪海洋是较发达国家拓展政治范围的重要目标,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秉持“由财产治理的政府的观念”^[11]。因此,商船、货物在海上移动,政府力量向海上延伸。海洋空间在19世纪仍未形成国际性公共政治,甚至在一个民族国家层面上政治公共性也很弱,因为率先在海洋中客观驱动海洋政治化的是资本家而不是政治家。这种状况就像莫兰所描述的“世界性在增长,但是没有世界主义的增长伴随”^[12]。

海洋法治的艰难探索是19世纪海权意识现实化的其中一种形式。这是历史性进步,海洋法治是海洋意识的一个方面,是海权意识和海洋经济意识等一系列海洋意识发展的结果。正在形成的航海条例等航海的法律就是海洋意识的国家化。马克思恩格斯曾考证过第一部海商法的出现,认为在中世纪进行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第一个城市阿马尔菲最早制定了海商法,它们是19世纪海洋法治的重要实践基础。不过19世纪的海洋法治主要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甚至一个城市。深度进入现实生产过程的海使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重要变化,19世纪在海洋活动助推下形成了经济性的世界市场,但并未形成有序的世界体系,因此海洋法治处于起步状态,海洋力量为国际发展之体系形成客观上创造可能性,但又同时阻碍其条件形成和现实化。海洋活动没有提出普遍的有效的政府管理,而是热衷于侵蚀多数国家的海洋参与能力,这一效果又不断引起国家的矛盾和危机,这种变化必然迫使整个海洋世界的治理体系发生历史变化。

四、海军成为新的强国象征和海权的保障

海洋政治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方面,他们重视海洋政治在世界文明发展和社会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海军这一海洋政治叙事是他们关于社会冲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所关注的重要方面。

海军历史性地成为强国象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基于海洋的经济塑造了新的强国形态,海权成为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方面,海军成为强

国象征。在19世纪,海洋对于一个国家的风险除了要作为环境应对和防范战争风险外,更为复杂的是,它需要一个国家做出更多的国家层面的应对,组建和壮大海军是应对方式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军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基于海洋的商业贸易的出现和发展。海军在19世纪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成为国家经济安全和贸易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海军还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推动力,海军和航海术、航海装备等一起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海军的出现是16—17世纪以来世界的重大变化之一,它通过政治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形式创造着社会革命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洋上的军事、暴力等新情况都源于经济情况的变化。基于贸易的航海是海军产生的社会基础,海军是19世纪最重要的暴力工具,海军与政治、工业、技术等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只有从这时起,我们才能谈到真正的海军。这是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期,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的时期。这一分析既揭示了海军产生的原因,又呈现了海军与海洋经济活动的依赖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基于海军的现代战争是人类活动的新形式。海战是海洋物质关系矛盾的表现形式,它在19世纪正不断增多。战争日益成为海战式的,以海军保护殖民地市场与贸易的时期“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13]382}。由于海洋在经济等方面的战略价值,海战与经济竞争常伴随出现,海战的理由也由于海洋引起的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12]563}。19世纪海洋政治秩序有很强的临时性,少数海洋强势国家所提的自由是不平衡的自由,是基于海军力量和工业竞争力的自由。野蛮形式的海洋强权推动着海洋政治形成,殖民主义是重要形式之一。

海军是海权的国家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国际政治的民主内涵还很有限,海洋政治关系处理中战争仍是主要形式,主权尚未成为海洋政治核心,其核心是海洋利益争夺。海洋生产能力的发挥使海洋成为重要政治空间,全球海洋控制和反全

球的博弈是海洋政治的重要逻辑,海军扮演海洋政治生成及现代化中的重要行动者。今天海洋权力、海洋利益与海洋责任是海洋政治核心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海洋政治主体是国际组织,而马克思恩格斯时期首要的是海洋权力与海洋利益,海洋政治主体主要是国家,而国家又主要依赖海军。在海洋世界里权力分配依靠海军舰队和工业实力确立,因此,除了具有一定的海权意识,海洋世界整体未形成较全面的权利和责任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 世纪的海洋政治活动是基于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理解的实践。整个欧美的海洋政治观念都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0]30},它们物质生活过程的重要活动就是控制贸易航线,以殖民等形式扩大生产和贸易,并用海军去巩固和延续这一过程。

围绕海洋重要国家间冲突不断,缺少社会的建构,也缺少国际民主去弥合国家与脆弱海洋社会之间的分裂。个别海洋强国凌驾于海洋关系构成的社会空间之上,缺少公共意识,因此也无意公正地处理海洋事务。如果把海洋事务理解为跨国跨阶级共同事务则它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制度和逻辑无法相容,因此 19 世纪海洋强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方式是把海洋关系国家化,把海洋公共性关系降为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性,采取的手段就是控制海洋及其利益。理解 19 世纪的海洋政治几乎用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的方式就可以了,海洋社会整体上依照强权逻辑切分为相互对抗的依附于各海洋国家的空间,并依靠海军来保护。

海军的政治影响力增强源自海洋经济活动需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传统海军作为政治存在历史较为久远,但现代海军的出现源自海洋经济活动需求。海军是海洋作为重要社会力量兴起的重要标志。海军是新的经济条件下保护海洋相关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是海洋权益现实化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因为海上通道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现代化的强大的海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军舰是海洋权益受到重视、工业快速发展的结果,“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样板,是浮在水上的工厂”^{[5]180}。海军地位的这种变化源自 19 世纪的生产的变化。

海军运转高度依赖海洋经济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海军需要依靠经济来发展,海军既是一种政

治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经济现实,海军与资本主义经济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为了满足经济的需要,海军力量持续得到扩充;另一方面海军又以生产水平为基础,“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5]173-174}。海战在 19 世纪出现更新的形态,蒸汽舰等新式军舰使海战发生彻底的变革,海战呈现完全区别于陆战的特征。技术突破了工业这一场域,工业也突破了经济空间,它们都进入了海军和海战,在海战和海军装备中的作用不断提升。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 中国历史和文明与海洋关系的研究中对 19 世纪中叶的海洋政治背景下中国的遭遇与海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以评论文章的形式多次分析了中华民族在 19 世纪遭受的命运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19 世纪的海外贸易是和舰队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正面临这一残酷现实。他们把英国对华鸦片战争称作海盗式的战争,指出海上的贸易和军事力量一同将在中国开展罪恶的活动。针对我国传统的海洋观念,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简短的分析,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3]615}。这是中国人现代海洋意识产生的历史基础,也是全球海洋经济时代开启时,中国屈辱地被迫进行社会巨变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

五、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政治思想的特征和对我国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性特征。他们用革命的哲学和方法论论述了海洋时代的国家观念,国家和国家关系的本质,国家兴衰的机理和地缘政治规律,指出了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利益基础,指出新的物质生产变革而非精神发展决定着国家兴衰,突破了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韦伯等人关于国家、国家关系的政治理论框架。

孟德斯鸠在 18 世纪中叶提出商业通过财富、艺术促进民族间的哲学等交流;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中后叶,在揭示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经济秩序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纽带关系过程中,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但还没有意识到海洋活动对于突破国家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19 世纪的思想家开始赞

美海洋对于国民经济的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叶指出,现代海洋实践的历史意义是它们把国家深度卷入世界贸易和秩序,使东西方和各地实际地联结在一起,并制造出危机等革命因素,指出海洋活动的世界性将推动世界性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权的论述揭示了海权背后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指出了海权的本质,认为海权意识是依赖海洋的全球性社会生产体系和方式的产物,它正在野蛮状态中探求法治等文明治理。卢梭对立法的需要和社会契约需求的分析无法解释海洋权益纷争中的法治现象,而马汉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海权论调仅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提供了事实验证。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海军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们超越了同时代关于战争和海战的研究,极富远见地认识到了海战的历史性转型和战争的革命性变化,指出了海军在军事史上历史性地位。17 世纪中叶海战在处理商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呈现,到被称为商业世纪的 18 世纪,海军成为海洋贸易的基本保障,海军作用不断扩大,但是西方政治学家们没有充分重视海战和海军。资本主义过程需要输出战争,更发达的海洋贸易带来了现代海战和日益庞大的海军。传统的战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矛盾使西方的政治学家们回避了这一问题,而马克思则深刻地揭示了海军和现代海战的物质关系原因和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启、文明的变革和近代的民族命运都与海洋引起的社会变化有密切关系。华夏历史和文明与海洋紧密相关,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有大量的关于海洋的道德叙事和政治经济学叙事。马克思恩格斯在大洋的另一边密切关注中国社会正发生的全面的变化,也关注了中国的海洋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于海洋另一边的东方社会的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是其理论体系生成中进行科学研究分析的重要基础,也反映出他们科学的态度和宽广的世界胸怀。

19 世纪到今天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性的基于全球化过程的延续,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基础上构建了海洋权益和冲突等为核心内容的海洋政治范畴。现代国际秩序与海洋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21 世纪作为海洋世纪,它的到来根本上源于海洋政治经济等引起的新的现代性

开放和世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海洋政治在世界政治格局形成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我国构建中的海洋政治学以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海洋政治因素和关系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政治思想尤其是其所揭示的海洋政治的规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事业和海洋政治学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第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海洋的重要论述。习近平重要讲话和在地方工作的实践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海洋思想,包括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法治、海洋科技创新和海洋权益等。这是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的最新中国化成果。习近平指出,21 世纪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对于海洋活动历史发展趋势做了战略性判断,尤其是提出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海洋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14]。习近平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论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海洋思想,推动了新时代在海洋经济建设、海洋文化建设、国际海洋治理体系以及海洋强国与中国梦的关系等方面创新发展。

第二,全面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海洋强国是现代强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海洋文明的伟大自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自觉地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思想,海洋战略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调整的过程。坚持海陆统筹,壮大海洋经济是新时代海洋经济战略的必然要求,要不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要增强海洋资源意识和经济意识,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海洋价值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渔业和海上运输是海洋最重要的资源价值,而今天在海洋科技和其他技术的支撑下,人类的海洋开发能力达到了历史性高度,海洋科技正向深水、绿色、安全领域突破。海洋经济等物质关系的发展会带来海洋文化的创新。要建立社会主义海洋文化体系,在我国海洋保护和开发中要加快中国海洋文化挖掘传承和创新。

要加强我国海权建设和海运事业。海洋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海权意识的形成是在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这一进程中实现的。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有更自觉的海洋权益意识和制度设计。海洋国土意识要不断增强,要建立包括强大的海洋国土法律体系、海洋文化体系等在内的海洋国土保护开发体系。海底、海水的生产

资料属性正在被不断强化。基于新技术海洋中的矿产、能源权益化是新时代海洋权利等海洋意识的重要内容。海权是海洋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实现的基本保障。海洋时代是不断发展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代中国人关于海洋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构想,它建立在新的时代节点上和对于海洋与经济关系的新的认识基础上。今天海洋的“道路”交通功能更加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海陆联动等有新的设想,海洋强国建设中要把航运强国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海军。海上力量是一国在国际海洋政治中参与的基础。今天软实力和硬实力都是影响全球海洋治理参与能力因素,但是硬实力所发挥的作用比软实力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影响权重常常更大。现代海军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海洋在全球安全环境生成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增强海上保护能力是经略海洋目标实现和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保障。

第三,推动构建现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和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治理秩序生成过程是复杂的海洋治理与国际权力的同构过程。一国政治中关于海洋的内容构成了本国的海洋政治,而多国共同参与的海洋政治过程是国际海洋政治。世界海洋政治地理结构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生成历史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19 世纪的海洋政治活动相对单一,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海洋政治更加复杂,海洋的自然边界和政治边界分殊。基于海洋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海洋治理体系变革重要目标之一。

海洋治理体系和海洋治理能力是国家海权意识和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对海洋全球治理的认识是我国全球治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需要现代化海洋政治理念支撑。要尽快推动海洋治理单元整合,推动海洋规范构建,形成更集成的框架性海洋治理体系。要进一步提升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要建立更加完备的政府海洋管理体制,抓住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正在快速变革之机遇。

要积极探索海洋政治大国建设路径。海洋强国战略是新时代的海洋政治自觉,海洋政治是海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不仅沟通起跨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跨国政治平台和议题。19 世纪海洋政治正尝试逐步走入世界政治舞台中心,各国对海洋的争夺更激烈,海洋的政治优先性不断提升,控制是

海洋行动的关键词,海洋政治实践整体上不是在制度空间进行的。今天海洋话语权在海洋活动中越来越重要,海洋的国际法等规范是保障海洋政治运转的重要工具。国家的有效推动是 19 世纪以来海洋治理力量增强的极为重要的方式,国家要创造有利于海洋力量增强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以及海洋经济政策,保持和增强海洋活动的自主性。要进一步强调国内国际海洋法治建设,完善海洋法律和与之配套的海洋制度建设,加强海洋执法管理体系建设。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政治思想的重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是海洋政治起步阶段,海洋政治现象远没有今天丰富复杂。但今天的海洋政治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等论述的深入发展,他们的海洋政治思想对于今天我国参与海洋国际关系构建具有重要启发价值。海洋共同体观念拓宽了海洋政治研究的视域,创新了处理海洋政治问题的视角。19 世纪的海洋利益格局整体上缺少共同利益,而是少部分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海洋强国的利益,今天的国际海洋政治要摆脱为少数国家服务的状态,现代海洋政治体系是在同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海洋政治体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艰难确立的,要推动全球海洋安全与互利合作。中国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主张和建构海洋秩序的理念正在为世界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智慧。新时代我国要在基于海洋的伙伴关系和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历史实践生成着新的精神,海洋政治文明是海洋实践的结果。未来的海洋政治观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将产生更加重要作用。海洋是未来水文明中最有潜力的内容之一,海洋文明将在未来有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发展,新时期的海洋梦想的实现将依靠创造性的海洋政治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洋政治思想是推动这一创造的重要理论武器,具有重要的时代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8.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中共

-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蒂内利. 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M]. 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80.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6.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6.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1] 萧公权. 政治多元论:当代政治理论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61.
- [12] 莫兰. 人本政治导言[M]. 陈一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7.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463.
- (收稿日期:2020 - 11 - 24 编辑:许宇鹏)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重点选题方向

为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成果,本刊 2022 年将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情况,组织刊发相关学术研究论文,以优秀的学术成果回馈伟大时代。

重点选题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

“十四五”规划纲要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科技、工程、生态(环境)哲学与伦理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共同富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老龄化、人口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研究;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智能化技术集成创新应用与数字经济研究。

投稿须知:

1. 围绕上述选题的稿件,本刊会快速审稿、择优发表;

2. 请作者通过网上投稿系统投稿,唯一投稿网址:<http://jour.hhu.edu.cn/hhdxbsk/home>;

3. 论文格式规范、参考文献规范及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见本刊清稿要求。

本刊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与环境”“经济与管理”3 个栏目,来稿可围绕上述主题,从不同视角展开跨学科研究。欢迎广大学者踊跃赐稿!

联系电话:025-83786376

官方邮箱:sk1999@vip.163.com